

今天是第42个植树节。在支付宝的“蚂蚁森林”，你每天步行18000步，就可以收获296g能量；线上购买电影票，可以得到180g能量；阅读电子书，可以获得150g能量。能量累积到17900g，你就可以认养一棵梭梭树，由“蚂蚁森林”项目将它种植在需要它的地方。从现场植树到网络植树，公民参与植树造林的方式经历了哪些变化？从今年7月1日起，“植树节立法”开始施行。我们又该如何进一步推动公众参与到绿化环境、保护生态中来？针对相关问题，《中国科学报》采访了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院长林震。



## 植树节「新生」

■本报记者 张文静

《中国科学报》：植树节设立以来，公众参与植树的方式经历了怎样的变迁？

林震：今年3月12日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42个植树节。1979年2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决定将每年3月12日定为植树节。1981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义务植树从此成为公民必须履行的一项义务。

一般意义上的公众参与，指的是公众义务植树或参与其他保护生态的活动。40多年来，这种参与的方式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最初，我们更多的是被组织到现场植树。上世纪80年代，我国还有很多荒地荒山，比如北京的西山国家森林公园，大部分是那时通过植树活动绿化起来的。到了后来，适合植树的地方越来越少。上世纪90年代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起来，可以以资代劳，就产生了通过捐款来植树的方式。新世纪以来，义务植树的方式更加多样化，比如购买森林碳汇等。

近年来，随着信息革命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互联网+义务植树兴起，公众参与植树更加便捷、智能和精准。2019年，“蚂蚁森林”项目获得了联合国最高环保荣誉——“地球卫士奖”和应对气候变化最高奖——“灯塔奖”。未来，如果能结合区块链等新技术，大家就可以对自己认养认种的树随时进行精确定位和跟踪监督。这是很好的方式。

2017年，全国绿化委员会制定出台了《全民

义务植树尽责形式管理办法（试行）》，规定了八大类共50多种尽责形式和折算标准，可谓与时俱进。

《中国科学报》：除了参与植树等活动，植树造林的公众参与还有哪些内涵？

林震：从政治学的意义上来说，在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公众参与应该贯穿到国家的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一系列过程中来。

我们现在讲开门立法，要广泛征求公众意见，建立公众参与讨论和制定法律的渠道，最近关于《野生动物保护法》修改的讨论和推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制定后还要更好地落实到实践中。在这个过程中，公众一方面是公共管理的对象、履行法律政策的主体，另一方面也要作为公民来监督各级政府对法律和公共政策的执行。

当前，我国正在不断推进治理现代化，公众参与的渠道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公开透明。同时，义务植树的内涵也被拓展到整个生态文明建设上来。公众需要更好地意识到，保护生态不仅是自己的义务，实际上更是一种权利。

《中国科学报》：2019年12月2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将“每年三月十二日为植树节”写入法中，自2020年7月1日起施行。植树节立法将产生什么影响？

林震：从法律位阶上看，《中华人民共和国

森林法》是生态文明领域的一个基本法。植树节立法，应该说是非常给力的，它能更好地为各级政府和每个公民通过各种形式履行植树造林的法定义务提供法律保障。

森林法中不仅规定了“植树造林、保护森林，是公民应尽的义务”，也规定了“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全民义务植树活动”“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森林资源保护的宣传教育和知识普及工作，鼓励和支持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新闻媒体、林业企事业单位、志愿者等开展森林资源保护宣传活动”。政府一方面要督促公众履职尽责，另一方面更要提供相应的便利条件，创新和保障公众参与植树造林的多种形式，这也是对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促进。

《中国科学报》：政府应进一步为公民参与植树造林提供便利和保障，当下应重点推进的是什么？

林震：我觉得，当前还需求大力气推动的是生态公益。公众义务植树的方式越来越多，就产生了更多关于认定和折算的问题。比如，规定中捐款捐物、参加野生动物栖息地修复等行为，都可以折算成义务植树，但是谁来折算、怎么折算，这个工作量是相当大的，仅靠相关政府部门和基金会是远远不够的。如果相应的支撑服务没做好，就很容易流于形式。

这时候，生态公益组织就可以发挥作用。有一个概念叫做爱心委托，我们应该合理引导生态公益组织的良性发展，激发整个社会的力量和作用。我们现在讲多元主体的系统治理、综合治理、绿色治理，就是要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各方都找到自己合适的定位，形成合力，从而发挥最大的效益。义务植树同样是一个需要现代化治理的系统工程。做好义务植树的相应管理和服务工作，其实也是公众参与植树造林的一个重要形式。

公益组织的设立和运作，是非常专业化的事情。目前，不少高校在推进慈善公益研究方面取得了许多成果，如北京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但仍然不够。北京林业大学和中国绿化基金会合作成立了中国生态公益研究院。各方通过探索专业化管理和运作方式，把钱花好，把树种好。

《中国科学报》：把树种好也是一件非常专业化的事情。

林震：对。植树的树种、密度、种树时间、养护方法等，都有讲究。让专业人做专业事，是一种发展趋势。2018年10月，在蚂蚁金服集团与

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中国绿化基金会签署“互联网+全民义务植树”战略合作协议的仪式上，中国绿化基金会主席陈述贤说，该基金会与“蚂蚁森林”的合作初步形成了五位一体的造林链路全新模式——通过“蚂蚁森林”公益平台，社会公众网上认养树木、蚂蚁金服集团捐资、地方专业单位造林、公益机构管理、互联网动态监察等五个环节协调互动，形成良性循环，保证项目持续有效实施。

从我个人感受上说，参与植树的效率也提高了很多。2018年，我在全民义务植树网捐款植树，需要后续自己查询尽责证书。今年，捐款后证书就即时生成了。

《中国科学报》：在您看来，如何进一步提高公众参与植树造林的意识？

林震：首先，各方面要多创造一些参与体验的机会。我一直主张，尤其是年轻的朋友，如果有一两次到现场义务植树、种植花草、美化环境的机会，还是要积极参与的。这不仅会让你亲近自然、认识自然、体验自然之美，也能体验到劳动之美。

另外，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也很重要。生态文明教育的目标是要真正形成生态文化的氛围，这样才能支撑生态文明建设的持续发展。现在，我国要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体系，其中包含五个方面，第一位就是构建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这就强调，我们必须要从根本上转变传统的人定胜天等观念，树立一种科学的自然观。在生态文明教育上，应该进一步加强理论化、体系性的研究和宣传。

同时，应该更充分地利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提高大家植树造林、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这种意识首先是一种法律义务感。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用“蚂蚁森林”或其他网络种树平台，是因为觉得它很有意思，或者把它当作一种献爱心的方式，但其实植树造林是我们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这种义务感也是需要仪式感来加强的，大家履职尽责之后给个证书，哪怕是个虚拟的荣誉，都有助于强化这种意识。

提高意识的另一个方面，是要加深对环境的理解。生态文明是需要我们共建共治共享的。我们说环境权，不是一味地让别人来保护我们，给我们提供良好的环境，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为保护生态环境作贡献。“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形成这种人人时时处处保护自然资源、践行生态文明的氛围和新风尚，我觉得是当前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 说史

# 爱尔兰大饥荒与大英帝国的解体

■杨靖

作为人类历史上和平时死亡人数最多的饥荒事件，爱尔兰大饥荒可以说既是大英帝国崩溃的开始，也为日后爱尔兰民族和国家独立奠定了法理基础。

艾米丽·勃朗特小说《呼啸山庄》的男主角是罗恩索从利物浦街上捡回的希思克利夫，当时他的模样“像是饥饿的稻草人，肮脏、破烂，面孔难以辨别”。小说中的希思克利夫就是饥饿的代名词，而饥饿的根源在于1845至1852年间爆发的爱尔兰大饥荒（或称马铃薯饥荒）。在饥荒最为严重的“黑色的1847年”，据爱尔兰科克郡地方官员尼古拉斯·康明斯描述：“我走进一间农家小屋，其场景令我瞠目结舌。六个因饥饿而骨瘦如柴、形同鬼魅的人躺在小屋角落的一堆脏稻草上。我以为他们已经死了，但当我靠近他们时，耳畔却传来一声声低吟。这些‘人’还活着……”据历史学家考证，自饥荒爆发之日到1847年6月，共有包括小希思克利夫在内的三十万爱尔兰饥民在利物浦港登岸。而在饥荒蔓延的数年之中，大英帝国治下的爱尔兰八百万人口锐减近四分之一；其中一百多万人丧生，另有约一百万人移民。

令人发指的是，即便是在饿殍遍野的危急关头，作为“附属殖民地”的爱尔兰出产的粮食类作物仍源源不断运往英国，而英国政府对爱尔兰民众见死不救的态度更导致其民心尽失。时至今日，绝大多数历史学家认同著名学者克里斯蒂娜·基尼利的看法，即这场马铃薯大饥荒是爱尔兰近代历史的分水岭：从某种意义上说，英国政府在爱尔兰大饥荒事件中的处置失当，不仅丧失了爱尔兰的人心，也使得盛极一时的大英帝国失去了道义基础。作为人类历史上和平时死亡人数最多的饥荒事件，爱尔兰大饥荒可以说既是大英帝国崩溃的开始，也为日后爱尔兰民族和国家独立奠定了法理基础。

兰，每亩土地可以产出六吨左右的马铃薯（而燕麦等谷物则不到一吨）。而且，通常即使其他农作物歉收的年份，马铃薯仍有收成，这对于长期遭受英格兰压迫的爱尔兰农民来说无疑是福音。然而这种单一作物的依赖性也为日后的灾难埋下了祸根。

大饥荒的暴发，至少在一开始，与英国政府的刻意隐瞒不无关系。早在1845年8月16日，英国《园丁纪事报》即已披露部分地区马铃薯“染病”。9月11日，爱尔兰《弗里曼报》报道宣称，马铃薯“霍乱”在爱尔兰北部地区大面积出现。两天后，《园丁纪事报》再次证实爱尔兰出现马铃薯“瘟疫”。然而，当时的英国政府却极力粉饰太平，声称这与往年农作物疾病“大同小异”——而事实上它正野心勃勃地拓展海外殖民地（为此不惜悍然发动鸦片战争），因此对于近在咫尺的“邻邦”爱尔兰，根本无暇顾及。

等到饥荒开始蔓延，时任英国首相皮尔爵士下令从美国订购玉米运往爱尔兰。但不幸的是，由于遭遇海上恶劣天气，航船抵达港口时，玉米大多已腐烂变质。更为不幸的是，迫于内部压力，皮尔首相于1846年决定废除《谷物法》，使爱尔兰小麦失去其在英国市场的垄断地位。而坐拥爱尔兰土地的英国地主，从逐利的角度出发，仍无视爱尔兰饥荒，强令大半田地由种植小麦改为经营畜牧业。此举大大削弱了人们抵抗饥荒的能力，并在相当程度上加剧了饥荒。所以时至今日，多数爱尔兰人始终坚信：英国政府一开始的不作为以及后来的“胡乱作为”是对爱尔兰的种族灭绝——其行径与纳粹屠杀犹太人，以及奥斯曼帝国灭绝亚美尼亚人如出一辙。

## 三

1846年，皮尔内阁垮台。继任的辉格党首相罗素勋爵（哲学家罗素的祖父）信奉自由放任主义，认为政府干预粮食会造成与自由市场争夺粮食，引起粮价上

涨，而地主和粮商进一步囤积居奇，又会加剧粮荒，进而引发英格兰本土的经济危机，故而主张采取“不干预”政策。更有甚者，曾任内阁财政大臣的查尔斯·蒙塔古是英国人口学家马尔萨斯的学生，也是冷酷的“人口论”信徒，他认为饥荒正是减少爱尔兰人口的一种有效机制——“这场灾难是上帝给爱尔兰人的教训”，因为爱尔兰农民生性懒散，不思进取，活该被淘汰。

在饥荒最为严重的几年间，爱尔兰仍被迫向英国本土“进贡”粮食，而且整个大饥荒期间爱尔兰都是粮食净出口。正如历史学家所说，英国政府并不需要爱尔兰的粮食，事实上政府只需买下爱尔兰的粮食，并将其散发给灾民，就可以有效地缓解饥荒。但高傲而冷漠的英国政客却无意于此，相反，一系列前后乖违、毫无人性的政策无异于趁火打劫、釜底抽薪，也使得这场自然灾害迅速演变成人祸。史载，当第一艘运粮船到达爱尔兰时，运送的救灾玉米根本无法食用，即便如此，民众如果想要申领这些无法食用的玉米，仍然需要极其复杂的程序和公文——许多时候，审批公文尚未下达，灾民已然饿死。更恶劣的是，英国政府不仅自己袖手旁观，还往往对来自国际社会的人道主义援助横加阻拦。比如土耳其苏丹捐款一英镑，却被英国外交部“劝退”——因为维多利亚女王捐赠不过区区两千英镑，害怕被打劫。

当然，和19世纪其他历史事件一样，大饥荒也逃不脱宗教因素的影响。自英国兼并爱尔兰之日起（1801年通过“英爱合并法案”），爱尔兰被正式纳入大英帝国的版图，从此彻底丧失政治和经济上的独立地位。合并以后，新教被宣布为爱尔兰国教，而天主教徒则被剥夺最基本的公民权利——不再合法享有土地所有权，于是大量爱尔兰中小所有者沦为佃农——向远在伦敦的英国地主缴纳地租，每年地租总额高达三百万英镑。而爱尔兰本土的人民，却由于“失血”过多常年挣扎在贫困和饥饿的边缘。大饥荒的

肆虐，更给饥寒交迫的爱尔兰人带来灭顶之灾。然而，英国的宗教人士却援引《圣经》，认为饥荒是对“不义”行为的惩罚：袭击爱尔兰的“灾害”正是对爱尔兰人无所事事、终日烂醉如泥生活方式的警告。与此同时，他们也提出斯威士特式的“善意”建议：应当尽早结束这种对马铃薯的“反常”依赖，以便享用更富有营养的以谷物为主的食品。

## 四

为了逃避饥荒，爱尔兰人被迫移民。从1846年末开始的十年间，共有约一百万人移民。这是19世纪最重要的也是最悲惨的一次人口流动：对这些男女老幼而言，与其说是自愿移民，不如说是灾难——成千上万的爱尔兰人抛家舍业，挤上开往北美新大陆的航船。爱尔兰移民的来到，为美国工业革命及时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在伊利运河、自由女神像、横穿北美铁路等大型工程的工地上，在芝加哥的工厂、宾夕法尼亚的煤矿和纽约的货运码头上，到处都能见到爱尔兰人的身影。移民促进了美国社会的多元化发展，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大熔炉”。当然，爱尔兰移民自身的惨痛经历也苦不堪言：无数爱尔兰移民在美国签下卖身契成为“白奴”，在美国的铁路工地上卖命——“美国铁路的每一根枕木下面，都横卧着一个爱尔兰工人的尸首”。这一人间惨剧，很大程度上乃是拜“冷血的”英国殖民者所赐，而这种刻骨铭心的仇恨，也很难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解或淡忘。

与此同时，留在“旧世界”的爱尔兰人民，也从大饥荒中逐步觉醒。在经历这一事件后，爱尔兰人民认清了殖民者的本质，决定奋起反抗。“天主教徒解放运动”“取消合并运动”“芬尼亚党人武装起义”“青年爱尔兰运动”等，都一次又一次地撼动了英国的统治基础。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世界反殖民运动浩大声势的影响下，爱尔兰人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更加高涨。1921年7月，英国军队在付出惨重代价后被迫签订《英爱条约》，爱尔兰正式退出英联邦。1937年，爱尔兰共和国宣告成立。而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则是印度独立——1947年，英王乔治六世放弃由莫卧儿王朝法统继承的皇帝头衔，大英帝国宣告寿终正寝。此时距爱尔兰大饥荒暴发，恰好一百年。（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 声音



英国曼彻斯特亚姆村瘟疫博物馆

“建立国家级防疫博物馆，是更为久远的公共卫生教育方式。”

——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中国国家博物馆原馆长陈履生如是说。疫情期间，宅在家里，陈履生一边整理、写作此前考察罗马尼亚博物馆的文章，一边萌生了提出建立“中国防疫博物馆”的想法，并开始对世界范围内的瘟疫类博物馆进行研究。

为重大瘟疫事件成立专门的博物馆，世界上已有先例，包括位于俄罗斯莫斯科市郊的隶属于伊万诺夫斯基病毒学研究所的病毒博物馆、建于1960年的澳大利亚人类疾病博物馆、日本目黑寄生虫学博物馆、英国曼彻斯特的亚姆村瘟疫博物馆等。

“目前，我们还没有国家级的医学博物馆，医学院中可能有一些小型展览馆，但它们只与专业教育有关，并不具有公共意义。”陈履生认为，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折射出我们在公共卫生、公共健康等教育层面仍存在问题，教育需要一个载体，而博物馆是最合适的一种方式。博物馆能够长期保留与重大瘟疫事件相关的遗存，给后人以警示。“博物馆本身就是纪念碑。”

陈履生呼吁，应当从现在开始，系统收集和整理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各种能反映此次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物品、资料等，包括医护人员的相关资料、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特殊病例的诊断资料、有代表性的口罩和包装盒等物品，等等。

“每个书店人都是孤立的，大家都是这个群体的一部分。诚实和爱，是我们应对危机最好的方式。”

——3月9日晚，单向空间联合淘宝直播、主播薇娅共同发起“保卫独立书店”直播企划。单向空间创始人许知远作为当班主播，毫不掩饰自己对主播一角的“难以适应”，在几番闲聊、打趣、问答与思考后，他说：“每个书店人都是孤立的，大家都是这个群体的一部分。诚实和爱，是我们应对危机最好的方式。”

突如其来的疫情让独立书店人备受煎熬。据实体书店联盟“书萌”于今年2月对全国1021家书店的调查，截至2月5日，90.7%的书店选择停业，超过99%的书店没有正常收入。尽管最近两周陆续传来了书店复业的消息，但疫情之下，客流量不复往日。

直播当晚，许知远连线了独立音乐人叶蓓以及南京先锋书店创始人钱小华、杭州晓风书屋创始人朱钰芳、重庆精典书店创始人杨一、广州1200bookshop创始人刘二鹏、海盐乌托邦书店创始人童兴家，共同为书店发声。（艾林）